

科技计划改革需重塑“政事关系”

□ 李研

近日,多家媒体报道了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消息,“一石激起千层浪”,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纷纷对《方案》给出各自解读。由于具体措施尚未公布,对于改革如何落实到位,改革对科研机构

么变得“专业”?政府“退一步”之后干什么?政府和新成立的专业机构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些都是绕不开的“难点”。

单位。但是,事业单位有效运行的关键在于“政事分开”。既然是为做事情成立的,就应保证其做事的独立性。我国的政府和事业单位主要体现为上下级行政隶属关系,事业单位也多按政府科层化管理,“泛行政化”必然导致其专业能力不足。

“政府+专业机构”模式已经走向成熟。无论是英国的研究理事会、美国的高级研究计划局,还是德国的项目协调管理计划,都以专业化作为建设方向,尽量淡化行政色彩。这些机构通常由融合了科学家、企业家、政府官员的理事会管理,在人员招聘、计划分配、项目组织方面具有较大自主权,对其评价主要看资助效率。科技行政部门的角色体现为宏观政策制定,以及在整个财政的大盘子中争取更多的科技预算等,科技政策和计划管理间存在着清晰的边界。



图/CFP

旅游线路申遗,这不科学

□ 杨雪

日前,徐霞客游线标志地认证工作正式启动。专家团队将在3年内对400年前徐霞客游历过的代表地进行考察认证,形成一条徐霞客游线,然后申遗,并希望在申遗的过程中推动徐霞客游线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

发,徐霞客游线申遗的推动者认为以“路线”为脉络穿起整个宏大图谱是个时髦且高大上的构想。但是形式可以模仿,本质无法复制,精神气质层面的东西,学不好就成了东施。丝路联结长安、河西走廊乃至地中海各国,那一条条东西的路以及沿途风景遗迹,是古代中西经济和文化交流的见证者;大运河纵贯南北,沟通五大水系,不同河段及沿线区域,是中国工农业经济发展的参与者。

作为“科学的春天”到“面向依靠”,从“科教兴国”到“创新驱动”,回顾我国每一轮改革,科技的改革总是走在前面。如今,由科技计划改革引领全面“政事关系”重塑的机会再次出现,本次科技计划改革能否担当重任,我们将拭目以待。

虽然徐霞客游线也可以由一个个具体的地点连接而成,但对于今天来说不外乎就是一条古代旅行发烧友走过的旅游线路。然而徐霞客旅行的意义实际上更在于科学,从文化层面上讲,他留给我们的地理学成就,而这种成就必须置于特定的时空。今天,我们旅行大多不会选择基本依靠徒步跋涉去历险,我们更有各种现代技术手段,来克服地理考察过程中的困难。将徐霞客游线置于今天,线路本身已经难以和文化正题挂扣。我想,所谓“不科学”,应该正在于此。

第三,以传播知识为主要目的的传统科普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代科普的复杂性需要,因此,今天的科学普及,需要借鉴其他领域的先进经验,如现代公关的理念和方法,将单向式的科普活动转化为一种当代文明建设和文化塑造活动。不仅将科学知识传播普及给公众,更要增进公众对于科学活动的整体理解。

另外,假设徐霞客游线申遗成功,到一路飙升的门票一定会影响到那些“穷游”的“当代徐霞客”。这就连游历本身都难以保障,还谈什么游线之外的文化内涵?

比如,让公众充分认识到调整能源结构是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问题,认识到在当前环境污染的大形势下必须发展核电和清洁能源,并充分了解我国的核技术是成熟的、安全的、可靠的,从而发自内心地支持核电建设。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化解当下的各种突发环境群体性事件危机。事实上,九江PX项目的建设已经开了个好头,PX装置技术人员走进来的一瓶PX,当场秒杀一切“有毒”言论,而“从PX装置距离总理办公室只有200米”,就像神来一笔,一下子赢得了人们的信赖。

请别那么“功利”地看待退学

□ 卢阳旭

最近,从北京大学退学,转投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的周浩进入了公众视野。人们之所以对他“饶有兴趣”,说得直白点,是因为在当前的社会价值体系中,周浩退出和进入的两所学校的差距太过悬殊,北大高材生与技校毕业生完全不在一个谱系中。但试想,如果周浩是在校内转了专业,或者通过其他渠道转到了他喜欢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也许就没这事了。

被消磨。

从媒体、公众和大V们的评论来看,人们对这件事的看法,总体而言是比较功利并带有成功学色彩的。虽然也有人从中看到了“追随自己内心”的勇气和努力,但与科普相关的评价和激励机制,从制度上引导科研人员以更大的热情从事科普工作。在这一点上,国家已经要求科学家在做科研计划和课题时,把科普作为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比如从2012年起,中国科协已和科技部、财政部等单位进行对接,在863、973等国家重大科研计划中开展科普工作的试点,增加一定比例的费用就能见到采访内容。

由于这个原因,目前包括北大在内的大多数国内院校都规定,在满足一定条件后,学生可以换专业,很多学生也确实成功地转了专业。但是,有人满足条件并成功地转了专业,并不代表没转成的人就只能赖自己,更不能证明这套标准就是合理的。更重要的是,单个组织的理性选择的加总并不一定带来整体理性。在实践中,各学校在设定换专业的标准时,一般都会考虑校内各专业人数的平衡、高考招生分数的高低以及各学院师资力量等因素。从机构管理角度来看,这些因素无疑都是需要考虑的,但它们在优先序列中确实不应该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

作为一个个体,周浩对之前所学如此不喜欢,对目前所学又是爱得如此真切,在爱憎分明的情况下,选择其实并不难。但一个必须认识到的事实是,大多数人在很多时候对不同选项的区分度并不高,当选择成本相对较高时,即便他明知目前所学不是自己最喜欢的,也不会再去选择更喜欢的另一个。从这个意义上说,好的教育系统应该能够有效降低人们发现、学习其所乐学的知识的成本。反之,一套不那么好的教育系统,会让很多人只能“无奈”地学习他们并不真正感兴趣的专业和知识,不仅学习时间被耽误,而且学习兴趣也

一套好的教育系统,应该鼓励每个人拥有自己的梦想,并为每个人实现梦想提供便利。以一套标准去衡量所有人的所有方面,虽然降低了管理成本,但损失了选择的可能性,压缩了梦想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在面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无论是出于“自负”,还是出于懒惰,认定、固守所谓的最佳教育模式和人才培养路径,按照一个模子去“培养”所有人,人为消减个体和社会的可能性,进而降低社会收益的角度看,改革教育系统,让其更符合人性与个人特质,在丰富选项的同时,降低选择成本,让每个人都能在一次次或多次选择和流动后,学到自己最喜欢学的知识,从事最适合自己的工作,都至关重要。

科普:只有转型才能走出困境

□ 王彩平

近年来,突发环境群体性事件陡然增加,如形形色色的PX项目事件、垃圾焚烧厂事件、核电站建设受阻事件等等。究其原因,既有公众出于自我保护目的,对身边环境风险的担心;也有政府环保承诺的公信力降低,公众对政府监管能力的怀疑;还有政府工作不力,对公众沟通环节重视不够,工作不到位等。

进行过诸多专业解释和说明,国内媒体也不断报道日本横滨PX装置与居民区仅一路之隔等国外经验,但公众“散步”的抗议依然不断上演,“一闹就停”的悲剧仍不断重演,PX困境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知识传播的范畴。

首先,随着时代变迁,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在今天建设生态文明的大背景下,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将是科学普及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如何通过科学活动造福未来生活,这不是某一级政府或者某

首先,从科学普及的视角进行观察就会发现,今天的科学传播令人堪忧。以PX项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为例,推动很多公众上街只是一种模糊的认识,或者说是一种对技术模糊的恐慌,也就是说,很多参与“散步”的公众对PX产品只是一知半解,并不清楚项目是否真的具有危害性。

其次,让公众充分认识到调整能源结构是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问题,认识到在当前环境污染的大形势下必须发展核电和清洁能源,并充分了解我国的核技术是成熟的、安全的、可靠的,从而发自内心地支持核电建设。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化解当下的各种突发环境群体性事件危机。事实上,九江PX项目的建设已经开了个好头,PX装置技术人员走进来的一瓶PX,当场秒杀一切“有毒”言论,而“从PX装置距离总理办公室只有200米”,就像神来一笔,一下子赢得了人们的信赖。

一直,科学普及被认为是开启民智、战胜愚昧的重要途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但纵观几十年来的全国科普工作可以看出,其工作机制一直是自上而下的,具有鲜明的教化式特点。然而,近年来突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增多表明,传统科普出现了问题,面临着严峻挑战。

其次,让公众充分认识到调整能源结构是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问题,认识到在当前环境污染的大形势下必须发展核电和清洁能源,并充分了解我国的核技术是成熟的、安全的、可靠的,从而发自内心地支持核电建设。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化解当下的各种突发环境群体性事件危机。事实上,九江PX项目的建设已经开了个好头,PX装置技术人员走进来的一瓶PX,当场秒杀一切“有毒”言论,而“从PX装置距离总理办公室只有200米”,就像神来一笔,一下子赢得了人们的信赖。

首先,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其双刃剑效应逐渐凸显。比如,滥用抗生素导致了“超级细菌”的诞生、核电站的核泄漏造成重大损失、工业化带来的全球性环境污染等,使得公众对科学技术产生了怀疑,“科学主义”的光环不再闪耀。

有专家指出,作为社会的守望者,大众传媒应当成为现代科普工作的主体。在美国,大众媒体相当于科技谣言的防火墙,谣言传播到这里就会止住,因为科学记者会对传播内容

首先,伴随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其双刃剑效应逐渐凸显。比如,滥用抗生素导致了“超级细菌”的诞生、核电站的核泄漏造成重大损失、工业化带来的全球性环境污染等,使得公众对科学技术产生了怀疑,“科学主义”的光环不再闪耀。

如何让科研人员热爱“搞科普”?

□ 王飞

上周,笔者参加了一个科普宣传能力建设培训班,一位授课老师谈到,搞好科普有很多办法,其中最关键的一个方法就是让科学家以及科技工作者亲自参与到科普活动去,对此笔者深以为然。

科研人员搞科普,不仅占用自己的研究时间,而且得不到任何显性的回报和实在利益,所以他们“没时间”、“没兴趣”搞科普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搞科普是有门槛的,没有专业知识背景的人多半望而却步,但这对于长期从事某一领域专业研究的科技工作者来说,似乎是轻车熟路的事情。无奈理想丰满,现实骨感,现如今很多科研人员对搞科普的态度,不是“兴趣不大”,就是“没有时间”。这背后有很多复杂的原因,笔者只想说自己感受最深的两点主要原因。

二是在当前的媒体舆论生态环境对科研人员搞科普也造成了一定影响。做科普,当然少不了媒体的传播。据笔者了解,目前一些科学家做科普的一个难点,就是非常担心自己说错了,而随着移动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发展,信息传播速度加快,这边科学家刚讲完话,可能5分钟以后网上就能见到采访内容。

回头看看“科幻文学专业能培养出科幻作家吗”这样的问题,背后也许包含着对大学教育的失望,似乎更透露着一种急功近利的焦虑和急躁。

实际上,社会公众已经有了一个广泛共识,即科普不是科学家的分外事,而是分内事,更是责任。那如何让科研人员担起这份

在创新风靡华夏大地的今天,很多与之相关的外来概念也来开拓自己的市场。一时间“第三次工业革命”、“工业4.0”等等语义翻新的词汇不断冲击着我们的眼球,也撩拨起我们的遐想。不过,就在这些看似花团锦簇的词汇背后,确实也隐藏着一些不容忽视的破绽。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准确地讲是加工制造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和所有后发工业化国家所走过的道路都是一致的。由于中国劳动力资源的庞大以及国内市场的巨大,使得中国制造业在数量上战绩赫赫,很快便跃居全球制造业大国第一的宝座。这种发展带来了中国对自身成绩的狂喜,而对于决定制造业发展形态的价值链却关注不够,以至于形成了今天尾大不掉的局面。

我们到底缺什么?缺少优秀的科幻作家,缺少优秀的科幻作品,缺少想象力,缺少独特性,缺少成熟的商业模式……这些东西是直面无视而就的。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直面现实问题,才更需要探索中国科幻文学的出路所在。这些最基础的工作不恰恰是科幻文学研究要去做的事吗?

可嘉,但反观过来,皇帝新衣能够出现或者畅行的原因,可能不只是皇帝本身的事情。我们可能会对工业4.0这个概念发起者嗤之以鼻,但是对于我们对其若若的态度也应冷静反思。中国之所以对于这样一个并无太大实质创新的概念反应敏感,还在于我们自身制造业的薄弱。

如此看来,与其喋喋不休地问“能不能培养出科幻作家”,不如抬起脚来,往前迈一步

该不该吃“工业4.0”的醋

□ 王晓松

先进的管理模式,导致很难在短期内形成国外那种以创新为主导的制造业新形态。这种窘境也同样影响着理论的进步。因为先进理念的持续发展来自于实践的前进,我们过长时间以来都在重复加工制造形态,也就很难给新型制造形态理论以成长的土壤。即便是有些闪光的花火,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

回到工业4.0这个概念本身来看,和其他所有先进理念一样,这些好的想法在过去的中国都不曾缺乏过。我们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不断有对于未来社会的描绘,很多还给出了未来工业发展的绚烂前景,即便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有很多都要先进于比我们发达的国家。在进入新世纪后,我们对于未来前沿技术的预测和展望也颇多着力,一些成果可能连其他科技昌明的国家也未必能够设想到。如此一来,如果我们拒绝在理念上已经十分先进、自信满满,进而排斥外来的想法,那不是又要重回封闭的时代了吗?



科幻文学博士,为何不可以有?

□ 榆木

近日,有媒体报道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全国独家”科幻文学研究方向明年将迎来首位博士生。

《三体》引发的对中国科幻文学的讨论仍在继续,2014年华语科幻星云奖刚刚颁布,《星际穿越》烧脑科幻大片正在热卖……在一月“科幻热”中,对于这个消息,舆论的第一反弹是,科幻文学专业能培养出科幻作家吗?

事实上,自2003年设立以来,科幻文学方向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已经默默存在了11年,它一直作为三级学科靠在“儿童文学”专业下面。曾获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的科幻作家吴岩是这个研究方向的固定老师。该方向明年将招收一名博士生,只是因为吴岩具备了博士生招生资格。而且,吴岩向媒体澄清,科幻文学明年新招的博士以学术科研为重点,要区分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两个概念。

尽管不一定直接培养科幻作家,科幻文学方向拥有招收博士生的资格本身就是对科幻文学专业肯定,至少肯定了科幻文学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正如吴岩所言,科幻文学本身有很多理论问题需要解决,比如什么是科幻,科幻在中国应该是什么形态才受欢迎,科幻小说怎么向科幻电影转型,中国科幻电影怎么更好地走向世界等等。

进一步而言,对科幻文学进行系统的梳理、研究,也会为科幻文学创作提供更好的思路和方向。正如科幻作家韩松所言,若有学术方面的解释,作家可以因此更了解科幻写作的规律和逻辑。

这种焦虑和急躁不无道理。今年口碑、票房俱佳的科幻大片《猩球崛起2》(超体)(星际穿越)几乎清一色都是好莱坞制造。据报道,10余年来,国产科幻电影拍摄不足10部,目前有10余部国产项目在筹拍,因此明年很有可能成为国产科幻电影的元年。在科幻文学创作方面,近年来夏笳、宝树、飞氲、陈楸帆等一批年轻的科幻作家崭露头角。刘慈欣的《三体》被评价为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的科幻文学提升到世界水平。但是,刘慈欣自己也坦言,与国际上的科幻经典相比,中国科幻文学的影响力实在是微不足道。总之,无论是“元年”还是“一己之力”,都反映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科幻产业的巨大差距。

如此看来,与其喋喋不休地问“能不能培养出科幻作家”,不如抬起脚来,往前迈一步